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谈

文艺可以载国,可以立人

赵彤

而立之年以后,每当听到国歌响起,禁不住联想到抗战历史,也禁不住想起贾谊在《新书·审微》中,借用孔子口吻写下的那段话:“夫乐者所以载国,国者所以载君。彼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亡而君从之。”

2500年前,孔子教导他的学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教诲他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歌不是本国音乐艺术的杰作,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童谣不是襁褓中婴儿最初的启蒙教材,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建筑不显现对自然和人的思考……

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精神的维系、传承与发展,需要文艺给予代有创新、代有成就的有力支撑。中华文艺的历史荣光,是代代成就汇聚而成的。告别周秦汉唐,走过唐宋明清,我们曾跌入低谷,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前辈吟咏过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变奏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今天,当我们奋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时,奏响时代前进的号角,展现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是以载国和立人为传统的中华文艺在新时代承载的新使命。

1949年的中国,接续着1894年的中国,接续着1894年之前的中国。65年过去,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探索,2014年的中国,不是1894年的晚清,不是1894年之前的历代王朝。今天,我们仍会感怀《关雎》的优美和《天问》的磅礴,仍会赞叹“夸父逐日”的想象和“女娲补天”的神奇,仍然会吟诵“会当凌绝顶”和“但愿人长久”的诗句,仍然感奋于《歌唱祖国》和《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

在感怀和感奋之外,我们也渴望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为人民喜闻乐见、击节应和,响及当代世界文化之林的作品不断涌现。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可以载国的文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记载历史光荣的作品,站在前人的肩头,面对壮阔的山河,当代中国文艺也应该也必须让后世子孙,感受到21世纪中国的筋骨、道德和温度,体味到在实现中国梦的历程中,祖国的步伐、气象和胸襟,触摸到人民的情怀、意志和理想。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达人之道,在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向上,才不会被阴影拘泥;向善,才能够义薄云天。王勃英年早逝,但其“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名句跨越了千年。范仲淹的诗句不可胜数,但数百年来为士农工商共同吟咏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舒婷及其诗作的年代已经过去,但是如我一代至今激动于地的宣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万分之一”。

3000年来,在我们的文艺史中,吟风弄月之作、搔首弄姿之作、无病呻吟之作、愤世嫉俗之作,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文雅,不可谓不当时之赏,但是经过时间的沉淀、艺术的考验、人民的选择而仍熠熠闪光的作品,无一不抒发向上向善的情怀,无一不昂扬着骨气、底气和正气的主旋律。

可以立人的文艺,从来都是在众声喧哗中脱颖而出,从来都是在人生的历练和对历史大势的把握中总结而来的,从来都不是从顾影自怜与自恋中生发,而是以忘我的精神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情怀中锤炼出来的。

“正声感人,而顺风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生焉”。

文艺评论家在京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光明日报社文艺部、中国艺术报社举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夏潮,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郭运德,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主席仲呈祥,以及傅庚辰、王丹彦、李春林、刘玉琴、彭程、向云驹、张德祥、赵彤、路侃、陆建德、李春青等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庞井君主持。

与会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现实高度和未来高度,对文艺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精辟论述,深刻阐明了事关文艺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艺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遵循。总书记的讲话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文艺工

作的行动指南和纲领性文件,对推进文艺繁荣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必将成为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史上的经典文献和重要里程碑。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对文艺批评作出了系统的阐述,与会者认为,这对今后开展健康的、有针对性的文艺批评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导性的纲领文件。而对于今后的文艺批评,与会者表示,一要牢牢把握文艺批评的导向和标准;二要进一步加强文艺评论队伍建设;三要精心策划或者选择一批影响当下文艺发展和繁荣的重点评论项目或者重点课题,组织理论家和艺术家加强研究,不断巩固文艺批评的阵地。

据悉,下一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还将采取举办论坛、座谈研讨、开设专栏等多种形式,持续深入开展讲话精神的学习贯彻工作,在全国文艺评论家中掀起学习讲话精神的热潮。(徐健)

《开国元勋朱德》展现朱德传奇的人生轨迹

由中央电视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威瑞斯中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的33集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开国元勋朱德》正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纪传体形式所创作的表现朱德一生的电视剧。该剧从朱德的出生开始,到考入讲武堂、上井冈山,直至晚年的革命生涯,追寻着朱德传奇的人生轨迹,揭开历史迷漫的烟云,真实、生动、震撼地塑造了这位一生功勋卓著而又从不居功、有着伟大人格和情操的开国元勋。“一生烽火传奇举世瞩目,半世爱恨情仇鲜为人知”。该剧以崭新的视角和丰富的历史信息,讲述历史上真实的朱德。剧作情节感人、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历史跨度大,感人亮点颇多。演员王伍福曾经在80余部作品中扮演过



朱德,此次再次饰演朱德,他感慨“向朱老总的人格魅力又大大走近了一步”,着重演绎了朱德身上的大将气派和儒将风度。

剧中的主题曲《扁担歌》由韩磊演唱,一曲扁担歌,一生担家国。朱德作为开国元勋,担负着历史的重任、国家重任,朱德的精神永远闪耀着历史的光辉。(央讯)

新作点评

《亲爱的》:一场情感悲剧的真实写照

刘佳



由陈可辛执导的影片《亲爱的》以两位主角的主观视角展开叙事,诉说了“打拐”事件相关的种种人与事,把世间最为真实、感人的亲情推向极致,体现出作为电影人应具备的社会责任感与创作诚意。正如陈可辛所言,拍《亲爱的》不是单纯地想要呈现“打拐”这件事,而更多地想要表达人性和人生的复杂。他将这种复杂置于大银幕之上,让观众在落泪后还能够从残酷的现实感受到温暖与希望,这种创作初衷切实体现了社会现实与银幕影像互为表征的内在关联。陈可辛将个人对现实社会状态的解读置于影像文本之中,而影像文本的社会功能与意义也通过这种内在关联得到了恰如其分地彰显。

《亲爱的》围绕着“寻找”进行了主题阐述,与其说是父母苦寻孩子,毋宁说是寻找作为父母的身份存在意义。影片正视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差异与情感困境,同时以一种适度的方式客观反映情感与法律之间存在的冲突,这种深切的现实关照与针砭当下彰显了一定的社会意义,成为一种善意的批判,进而对整个社会起到警醒与启迪作用。影片以央视法制栏目的真实案件为基础创作,将镜头对准底层市民的平凡故事,将寻子、打拐引出的社会现状加以客观呈现,构建了大银幕上的当代中国群像。影片的故事内涵和人物形象极为丰富,对

人物的社会背景、人际关系等也进行了艺术化解构。如韩德忠的人物原型并不是一个“土豪”,而鲁晓娟夫妇在现实里并没有离婚。这些杜撰的细节设计非但没有让观众觉得突兀或脱离现实,反而恰当地反映了影片主创对整体情感基调的准确把握。

对于此类拐卖儿童的真实事件,故事往往终结在孩子被找到、回到亲生父母身边,而对于《亲爱的》而言,孩子找到后,故事才刚刚开始。陈可辛将更多的精力置于还原整个事件本来的格局与面貌——浓烈的爱和亲情却酿成了一场悲剧,前半部分是典型的寻子、打拐,孩子被找到后则是颇具悲剧色彩的后半部分。在这一部分,叙事的视点从亲生父亲田文军变为“养母”李红琴,陈可辛不惜笔墨地对两位主角“失去”孩子之后的情感纠结与内心痛苦加以挖掘、展现,使得这种无法对外人言明的情感挣扎显得更为真切,从而强化了情感的撕扯。陈可辛的这种创作意图可以从影片前半部分一个在观众看来完全可以避免的细节中得到充分印证:田鹏追着鲁晓娟的汽车跑了着实不短的一段路,鲁晓娟仿佛故意不看后视镜,而直到后来她才懊悔地承认当时自己隐约感觉到儿子在追自己的车,但却选择不去理会。为此观众不禁要质疑,即便在正常行驶中,司机也应该时不时地看一眼后视镜,显然这种处理

与现实不符。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设计或许是陈可辛有意为之,但它完全符合电影的叙事逻辑,因为正是这类只要稍微留心就能避免的日常失误,才导致了一些无法逆转的生活悲剧。

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拐卖本身的阴暗与罪恶,同时对拐卖事件的相关人物进行了巧妙处理,似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任何人能够引起观众真正的仇恨或憎恶,更多的是让观众看到,如果从本质上衡量,片中的人物都是善良且值得被爱的。作为一名没有文化的安徽农村妇女,李红琴被现实生活与生育压力所累,面对警察的询问与质疑,她惊慌懦弱,但她对丈夫“带回来”的两个孩子疼爱至极,那种对“小家伙”的爱顽强得超越一切,甚至超越了血缘。虽然在通常意义上,李红琴是一个反面角色,但在拐卖儿童的现实案件中却是极为个例的存在,正是由于她在影片后半部分的出现,将观众带入到她个人的痛苦与无助中,从而让观众看到了生活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双面性。这非但没有妨碍观众对其产生强烈的同情与共鸣,反而给予观众更多抒发情绪的空间,更加深刻感受到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悲哀。

这种人物的双面性也体现在律师高夏身上。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他却为了利益做着违法的事情;面对苦苦寻求法律帮助的李红琴,他一脸的不屑,声称没有律师费一切免谈……观众无法想象如此贪图利益的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他每天毫无怨言地照顾家中精神失常的母亲。当“寻子团”成员对李红琴当众辱骂、拳脚相加时,惟利是图的高夏似乎被唤醒,拼命地维护李红琴,为其辩解。当高夏扶着李红琴远离人群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我也不能什么事都管”的小律师,而成为李红琴生活的出路,即便她的生活已经逐步演化成一场悲剧,但高夏却为她争取孩子抚养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生命里一缕善意的温暖。

此外,影片叙事技法娴熟,在细节展现上也颇下了一番功夫。影片将经常被忽视的生活环境加以放大,如电线杆上杂乱的电线,深圳狭长的小巷,以及田鹏蹲在幼儿园围栏外面看着里面的小朋友玩耍等,通过这些具有生活质感的真实情景体现了对当下中国现实生活的关照。诸如田文军教儿子进行展示,陕北童谣、田文军和李红琴最惦记的“别给孩子吃桃”等语言表述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片尾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将影片主创与现实原型人物会面、对原型人物的相关真实事件进行展现,再次令观众感受到情感的震撼,亦凸显了影片与当下其他类型片的与众不同之处。

批评家在线

《心花路放》:何至于此

刘藩



对宁浩,很多观众是有期待的。这期待中,有现实质感,有本土化的类型探索,有叙事的智慧,有影像的品质,有青年导演的锐度和犀利。因为《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曾经凭借充满创意的本土化类型探索、浓郁的市井气息、复杂的叙事、底层对上流的嘲讽制造了青年导演的艺术和市场奇迹。于是,我们期待着,宁浩能在《心花路放》中对公路喜剧片进行一次本土化的类型探索,为我们再一次呈现电影艺术的美妙之处。

仅从市场表现看,宁浩似乎成功了。凭借强大的喜剧主创阵容、人气爆棚的黄金档期、精心策划的预售和点映、铺天盖地的新媒体营销,尤其是强大的预售换来的高排片量,《心花路放》独霸国庆档期,上映以来票房突破10亿。

但是,看完影片,我们失望了。作为国内青年导演的标杆,在电影业界学界和影迷中早已功成名就的宁浩,已经不再是一个为了对得起投资人而一味急功近利迎合市场保证回收的小导演。他完全可以调动更多资源,在电影艺术的探索上更上层楼。可是,《心花路放》却摆明了是一个

攒出来的、不认真的、过度迎合市场的敷衍之作。宁浩,何至于此。

不可否认,《心花路放》能够票房大卖,确有道理。片中部分段落的喜剧效果是有设计的,比如黄渤冒充网友找杀马特小女友一段,小男友耍横反被黄渤教训;比如没刹住的小车下坡一段,击中了观众条件反射性的笑点;比如小姐变大姐一段,在黑社会威胁之下,之前的台词换了基调重新再来一遍,充满市井气息和喜感。但是,从

整体来看,影片的人物设计、结构设置、情节逻辑和审美趣味都有明显的问题。

人物方面,公路片的一个常规是主人公为摆脱某种困境走上公路,以主人公有一定目标的一段旅程作为载体,通过主人公在路上所经历的种种事件,最后完成某种内心的转变。而该片仅仅是提供了简单的段子式的笑料。肤浅的男女情事,飘散的荷尔蒙气息和俗套的台词,怎能带来合情合理的人物转变?于是,最终黄渤走出阴影的转变就变得刻意、人为和突兀。

结构方面,公路片有单线和双线两种。但该片的双线结构并没有起到双线交叉呼应、制造张力的效果,而仅仅是耍了一个叙事的诡计,在最后让观众惊奇一下:原来黄渤没有去大理邂逅袁泉,袁泉作为前妻,就是“阴影制造者”。而袁泉这条线,不但与主线没有交叉,没有制造张力,反而拖累了主线的节奏。情节逻辑不合理,除了黄渤走出阴影不合理,还有徐铮浪子回头、徐铮及时赶到打架现场、阿凡达小妹千里追爱、小狗粮汁时不在等都略显粗糙。

以上的问题其实一般人还不太在意,观众诟病最多的其实是趣味问题。该片对性的反复展示和调侃,都飘散着一种粗俗的趣味。面对这样的影片,那些带着孩子走进影院的家长会怎么想呢?

我们宁愿相信,《心花路放》只是导演偶一为之的娱乐;但我们更期待,青年导演所独具的那份锐度与犀利,能够在未来灵光再现。

首届两岸三地编剧论坛在京举行

编剧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统优势

和内涵虽然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界定和探讨,但是电视剧的“国剧梦”离不开对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的表现,应该充分发挥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优势。有专家建议编剧不妨把中国的上古神话、唐宋时期的神话传说、历史上著名的故事好好地梳理一下,仔细揣摩中国人喜欢讲什么故事。然后把这部分题材,包括民间传说中很多优秀的东西,用电视剧这一覆盖面最广的文化载体传播出来,这样不仅会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文化效应,而且能使中

国故事、中国精神在全世界得到发扬光大。有编剧提出了地域性差异带来的创作难度,也有编剧提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带来的创作隔阂,对此,编剧程蔚东认为,每一个编剧写作的时候都是在写你感受到、理解到的生活,不管是写古代的戏,还是现代的戏,哪怕是写幻想、写传说,写未来,只要能够真诚地面对生活,真诚地面对自己、真诚地面对观众,并在写作中寻找到你所理解的生活中间的那个“你”,这样写出来的作

品就是鲜活的作品。编剧周振天认为,现在常说的“接地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就是人物的语言、故事的桥段,乃至表现的细节,要有根有据,是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不能胡编乱造;广义上则是大的文化范畴,比如中国的丝绸文化、中医中药文化、饮食文化、家居文化等等。两岸三地的编剧可以从广义的范畴中寻找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然后以精益求精的艺术态度进行狭义的创作,进而使我们的电视剧成为维系我们精神家园的沃土。(徐健)